

天壇，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和建築文化的結晶

姜舜源

七日談

（北京篇）

國家主席習近平五月同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參觀天壇，在祈年殿廣場合影的情景，定格了中美兩個大國以及所代表的東西文化交往交流的一個歷史時刻。習主席說：天壇展現出中國人的宇宙觀和處世哲學。中國古代執政者在天壇舉行祭祀大典，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體現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中國傳統思想。中國共產黨傳承發展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堅定支持和衷心擁護。

明清北京城中軸線的主題，就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中軸線南端天橋路西與天壇遙相呼應的，是先農壇。天子每年春分時節，到此祭奠中華農業文明的始祖「神農氏」，接着舉行親耕典禮「耜田禮」。皇帝像農夫一樣，手扶耒耜耕地兩個來回，親手播下種子，順天府官員們之後要悉心照料這塊農田，直到秋收。再往城裏走，天安門內、午門外西側，是社稷壇，收集代表全國東西南北中土地的五色土，在那裏祭祀土地之神「太社」、五穀之神「太稷」，祈求土地肥沃、農業豐收。甚至於以土地、穀物代表國家政權，稱為「社稷」。直至我們新中國的國徽，還是由天安門代表社會主義祖國、穀穗和齒輪代表工農聯盟，傳承發展了傳統社稷的精髓。最後進入皇宮核心區，在皇帝寢宮乾清宮，丹陛前東西兩側，高建江山、社稷小金殿，遣官每日行禮拜祭，時刻提醒當政者以江山社稷為念。

天壇南為圓丘、北為祈年殿，這種兩大祭壇排列的格局，是明嘉靖九年（一五三〇年）確立的。國家法定，冬至日黎明，天子步行登

上圓丘壇，向父親皇天上帝年終述職，匯報一年工作。在壇中心「天心石」上，相傳甚至可以聆聽天音。若是施政不當、民怨沸騰，他則需到天壇向老天爺請罪，表示痛改前非。清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改原「祈穀壇」名為「祈年殿」，作為天子代表天下人向上天祈求五穀豐登的地方，每年正月的第一個天干「辛」日，皇帝親自來此祭天行大禮。今天看到的祈年殿是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雷擊火災後，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重建的。史載：當時《大清會典》沒留下建築圖紙，也沒有建築測量資料，火災後無法勘測量估，甚至翻閱《大明會典》也沒什麼收穫。於是集匠師們集思廣益。有一位匠師曾經參與過小修工程，憑着他的記憶和眾匠師舉一反三，竟然制定出重建方案，繪製出設計圖紙。這也反映了我國傳統建築技術成熟臻於爐火純青程度。

祈年殿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圓頂造型。它坐落在漢白玉圓形三台基座上，三台高六米，佔地五千九百平方米，象徵天有三重。祈年殿高三十八米，直徑三十二點七二米，三重檐殿頂，是現存中國古代最高的建築之一。屋面瓦壟自下而上逐漸收縮，但一壟不少，瓦片自下而上逐漸變小，嚴絲合縫，古建築上稱為「竹節瓦」，不同於方亭四面坡屋頂瓦壟尺寸一成不變的做法。這種圓頂建築構造原理類似於我們日常使用的雨傘。

祈年殿的樑架結構是，柱子平面構成三層柱網。最外一圍，是十二根簷柱支撐下層檐；中間一圍，是十二根金柱支撐中層檐；最裏一圍，正中四根巨大的金龍柱支撐上層檐。內部頂子樑架的結構，是在四根金柱之上做成四方

形的樑架，然後在上面安置圓形托斗枋，其上立直柱，承托上層斗拱。上層屋頂用扒枋、圓形托斗枋、井口枋、十字樑等組成圓形屋架。在圓形樑子之上鋪設放射形的椽子、望板，鋪瓦，做成一個圓形攢尖大屋頂。殿內的結構與裝飾都形成由圓心向外放射圖案，正中頂上以圓形藻井的龍頭為中心向外放射，均達到圓形結構與圓形圖案的統一效果。湛藍天空裏，三重簷藍色琉璃瓦屋頂，承以潔白的三台，紅柱、彤扉、金瑣窗、金碧輝煌的檐下彩畫，此情只合天上有。

祈年殿的圓形結構也屬於樑柱式體系，但與一般方形殿的樑柱架結構略有不同，除了用彎圓的枋椽構件之外，直樑的搭架也是作為達到圓形架構而考慮的。彎樑的製作技術也較一般直樑的難度大。它的做法有兩種：小型的構件可以用加熱、水濕彎壓方法使之彎曲；大型構件，則使用內外砍加拼鑲找圓的方法製作。一般圓形的構件只用於枋、不承受重大壓力的地方。承重樑枋，則仍用直的大料製作。

中國傳統建築的技術含量富集點之一在屋頂上。其中造型變幻豐富的是攢尖頂，分四角攢尖、六角攢尖及更多角攢尖和圓形攢尖。四角攢尖多用於宮殿中，其建築平面呈方形，四面坡面積相同，

四條垂脊直通屋頂最高處，攢集在尖頂處，故稱攢尖。攢尖處安裝寶頂，以覆蓋這個組合部位。故宮中和殿、交泰殿是單檐四角攢尖頂，午門城台上四個方亭是重檐四角攢尖頂，景山萬春亭則為三重檐四角攢尖頂。景山萬春亭兩側的觀妙亭、輯芳亭則為重檐六角攢尖。

圓形攢尖頂被單列為圓頂。因為它沒有垂脊，不存在四條或六條、八條垂脊攢集在頂端。圓頂造型既可以顯示中國傳統建築端莊渾厚的藝術風格，如祈年殿，還有天壇象徵昊天上帝寢宮的皇穹宇；也可以顯示俊美秀逸的藝術風格，如景山五亭最外兩側的周賞亭、富覽亭、御花園千秋亭、萬春亭。著名的圓頂建築還有承德外八廟之一的普樂寺的旭光閣等，的確展現出中國精美的古典建築藝術和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令人讚嘆。



▲天壇祈年殿。 作者供圖

中國第一所大學與香港(上)



流動空間

方元

在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學成立之前，皇仁書院的畢業生王寵惠去哪裏上大學？如果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有多所大學可供他選擇，例如上海聖約翰大學、南京金陵大學等。但在一八九五年，王寵惠只有一個選項——天津北洋大學堂，因為當時在中國它是唯一的大學。

今日的香港人未必聽說過這所北方的高等學府，但熟悉中國近代教育史的學者都知道，北洋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官辦的西式大學。王寵惠報考的那年是它創立的第一年。

十九世紀晚期是中國近代教育體制加速轉型的時期，湧現出許多新型西式高等院校，開創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學科，因而造就出一批（而不是一個）「中國第一」。例如，第一所船舶工程學校——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所海軍軍事學校——天津水師學堂、第一所西醫學校——天津北洋醫學堂等。這些學校都是官辦的高等教育機構，而且成立的時間都早於北洋大學堂。實際上，西式高等教育的船隊在一八九五年之前已破浪啟航。

不過，北洋大學堂不必擔心失去「中國第一」的桂冠。雖然那些學堂成立得早，但它們是單一學科的、提供特定專業的學校。北洋大學堂則是大型的綜合性學校，擁有多個學系，設有多種專業，屬於等級最高的學府。這種「全盤西式」的學校在成立時便採用了中英雙語校名，「學堂」對應「college」，「大學堂」對應「university」。

所以，如果以「大學」而論，北洋大學堂穩坐中國第一把交椅。

事實上，一八九五年是一條歷史分界線，在此之前成立的高等院校都是college或準大學的性質，而北洋大學堂是第一所名副其實的university。更重要的分別是，一八九五年以前的新式學堂都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框架下辦學，北洋大學堂則不再受那個框架的約束，而成為一個全盤西化的試點。

說到香港人與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歷史聯繫，最近有篇題為《一紙文憑 百年傳奇》的文章（《大公報》，三月九日）提到，一八八一年成立的天津北洋醫學堂特地遠赴香港招生。令人稱奇的是，天津北洋大學堂也有同樣的故事。兩所位於北方的高等精英學府都選擇去香港招生，這大概不是巧合。

一八九五年的中國，科舉制度仍居於正統的地位。在「中體西用」的觀念下，西式學校不免會被士大夫們看低一等。而且，由於西式學校聘用洋人教師、使用洋文書本，不讀四書五經，不走科舉之路，因此學校在傳統和保守的地區招生不易。然而，在上海、香港等較為西化的地區，西式學校受到新派士紳階層的歡迎。

今日的香港人很難想像到北洋大學堂當年在香港招生時的盛況。根據校史學者吳曉的考證，一八九五年十月中旬，大學堂在香港招收第一屆新生時，吸引了近三百人報考。在被錄取的六十多名學生中，皇仁書院的畢業生佔了五成。那一年，大學堂在天津、上海和香港三地招生，總共錄取了八十七人，其中香港的學生佔了七成以上。



君子玉言

小杏

這本書是我從香港回京時，小樂送我的。我背着書，和口罩一起擠在隨身包裹，粵菜師傅榮貽生和徒弟五舉的故事，陪我一起捱過疫情隔離的日子。扉頁上，有作家葛亮寫的親筆字：「××女史存正」，墨跡端正安靜。床頭還擺着他的另外兩本《瓦貓》《北冥》，那些溫潤的文字，平復了無數不眠之夜的焦慮。

六月十一日晚，國家話劇院劇場，《燕食記》作為話劇開演。榮師傅和五舉的故事，再次以鮮活的演繹呈現。從民國時期廣州西關得月閣到戰後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同欽樓，一鍋蓮蓉打了四十年，打出名堂，也打出恩情與裂隙。徒弟另立門戶，師徒各走各路，直到一場美食大賽重逢，舊日火候重聚，情義再續。故事橫跨幾十年，一代又一代人，蓮蓉的回甘裏，藏着人間百味。

大幕拉開，幕布上打出「××××年代，香港利舞臺」字樣，茶樓裏，木桌椅，吊扇慢悠悠轉動。背景板上，中環的街景、繁體字的招牌、灣仔的窄巷，電線在樓與樓之間牽來牽去。那些年在香港生活的場景——砵典街那段石板路，灣仔道拐角的燒臘舖，上環西港城轉彎處的叮叮車……一閃現，舞台上的背景不過幾秒，但我看着，像翻一本舊相冊。

戲裏的人偶爾講一兩句粵語台詞，「唔該」、「食咗未」、「好嘢啱啱」，旁邊的閩蜜悄聲問我「啥意思啊？」我忍不住笑了。這些聲音，我以為早忘了，其實都存在腦子裏。像在路上撞見熟人——茶餐廳阿姐問「飲咩」，的士司機從後視鏡裏隨口說「去邊度」，便利店收銀員找零時講「多謝晒」——那些年的日子，全都回來了。

回甘

——觀話劇《燕食記》

「打蓮蓉」那場，榮貽生站在灶台前，銅鍋架在火上，一下一下翻炒。舞台上沒有真的蓮蓉，可我彷彿聞到那股甜香——銅鑼灣老餅舖的玻璃櫃裏，跨越九十三年代的陸羽茶室木柵包廂中，白胖的蓮蓉包頂上點一顆紅印，拆開來麥香與蓮香蒸騰；中秋前後港式茶樓的蓮蓉月餅，切開時蓮蓉與蛋黃層層分明。

戲的結尾，師徒在飲食大賽對決。榮師傅因手痛無法繼續打製蓮蓉，打播的徒弟五舉放下自己的活計，端起師傅的炒鍋，重新炒蓮蓉，做成鴛鴦月餅，一半蓮蓉黑芝麻、一半奶黃流心，猶如陰陽，包容相照。這場決賽無人勝出，卻成佳話。閉幕後，劇院在大堂為觀眾分發蓮蓉包，限量五十份。人們很快就排起隊伍，開心等待。我望望隊伍，還是離開了。其實我很好奇：國家話劇院的蓮蓉包，與那些年在香港吃到的，有什麼不同嗎？

口味真是奇妙。在香港待了幾年，那個並非祖籍地的口味，不知何時也纏上了舌尖，成了另一種鄉愁。回京後每每路過粵式茶樓，會停下來張望一眼，像望一個老朋友。



▲話劇《燕食記》。 作者供圖

《周禮》注說，「燕食，謂日中與夕食」，乃尋常人家的午晚餐。上至王侯下至庶民，人人都有燕食。最貼近煙火日常的，恰恰承載了最深的根——一片茶樓，一桌燕食，見證百年眾生相。政客、文人、工匠、難民……在此交匯聚散，生命通經斷緯，編織南粵大地錦繡，鋪陳一席盛宴。百川匯聚香江，一邊碰撞、一邊融合，「一時間便是龍虎之勢」。那鍋蓮蓉打了四十年，四十年足夠一個人從壯年走到白頭，足夠一座城市換幾副面孔。可有些東西卻凝神溯流——茶樓裏那一籠蝦餃、一枚蓮蓉包，咬下去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裏來。無論漂泊多遠，一口茶點就能讓人找到來路。端起茶盅，對面而視，「味蕾深處忽而漾起一模一樣的氣息。」

戲裏戲外，香港都是這樣一個地方。打蓮蓉用的湘蓮，蝦餃包着江南的蟹黃，燒賣上點綴着雲腿，蛋撻的酥皮帶着葡國的油香。一個城市的味蕾雜糅着四方來路，卻調和出一套獨有的秩序——中西之間、新舊之間，不撕扯，不排斥，一盅兩件，安安靜靜地各安其位。四方水土匯於茶樓百味，滲入這片土地的風物朝暮，尋常肌理。

時代的波浪潮起潮落，打蓮蓉的師傅會老去，很多手藝或許也將被AI替代，但千年煙火裏熬出的鑊氣，是誰也帶不走的根性。

戲裏的人繼續炒蓮蓉，戲外的人繼續趕路——有人從廣州到香港，有人從香港回北京。奔波從未停止，像那些年漂過南中國海的船隻，一程又一程，帶走的是人，帶不走的是舌尖。你以為忘了的滋味，其實都沉在舌根底下，像一齣戲落幕，餘韻還在；一座城遠了，回甘還長。

再次翻開《燕食記》，扉頁上葛亮的字依然清晰。那些居港的歲月，終究在戲裏又走了一遭。

世界盃的魅力



如是我見

王汐鈺

四年一度，世界盃如約而至，這場全球球迷都盼着的足球盛事，再次掀起全民看球熱潮。礙於時差，本屆不少焦點賽事都排在深夜乃至凌晨，亞洲球迷想要追完整直播，只能犧牲睡眠時間硬撐。明知傷身，卻依舊心甘情願，大概這就是世界盃獨有的魔力。

常常有人不解，不過是場上球員來回跑動踢球，為何能讓男女老少、各行各業的人都為之着迷？

其實足球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複雜的戰術，而是九十分鐘的比拼，沒有提前劇透，沒有既定結局，哪怕一路領先，也未必能穩拿勝利，不到終場哨響，一切皆有可能。這份未知的懸念，就是足球最抓人眼球的地方。綠茵場上，永遠沒有穩贏不輸的球隊。

一眾傳統強隊，偶爾也會意外翻車爆冷；一些名氣不大、陣容普通的隊伍，也能靠着團結拚勁一路逆襲。賽場局勢瞬息萬變，前一秒還牢牢掌握攻勢，下一秒就可能出現失誤丟分。整場比賽揪心又刺激，心情跟着場上節奏起起落落。

而且比起最終的比分勝負，球員不肯認輸的拚勁，才最讓人動容。有的球隊全場落後，差距明顯，卻依舊不肯擺爛，每一次防守、每一次反擊都拚盡全力；有的球員帶着傷病上場，忍着酸痛堅持跑完每一分鐘，只為不辜負全隊的努力。比賽總有輸贏，但全力以赴、永不低頭的態度，遠比一座獎盃更珍貴。

當然，看球最過癮的，還是熱鬧的氛圍感。一個人在家安靜看球，總覺得少了點滋

味，和一眾球迷圍坐一起觀賽，才是看球的正確打開方式。每逢焦點大戰，街邊酒吧、宵夜大牌檔總是座無虛席，滿場都是等着看球的人。

場上發起進攻，全場瞬間安靜屏息；起腳射門的一刻，所有人忍不住齊聲大喊；可惜射門偏出，滿場都是整齊的惋惜嘆氣；一旦成功破門，歡呼聲瞬間炸開，互不相識的人也會碰杯歡呼。不用刻意寒暄，不用多說一句話，同喜同悲，這份陌生人之間的同頻共鳴，格外難得。

不想出門湊熱鬧，居家看球也別有一番樂趣。約上兩三好友，備好啤酒小吃，窩在客廳自在觀賽，不用顧及旁人，情緒隨心釋放。有趣的是，深夜球賽激戰正酣時，常常能聽見隔壁樓棟傳來吶喊或是嘆息聲，整棟

樓暗藏無數球迷，大家隔空共情，也是獨屬於世界盃的人間煙火。

除此之外，世界盃還有一份跨越國界的溫柔。世界各地球員語言不通、文化各異，卻因為足球相聚一處。場上是全力比拼的對手，場下是互相尊重的同好，賽後握手擁抱，放下競爭與隔閡。足球從不需要多餘的語言，就能拉近全世界熱愛足球的人。

我們沉迷世界盃，是喜歡賽場瞬息萬變的刺激，喜歡萬人同歡的熱鬧，更喜歡那份不到最後一刻絕不放棄的執著。其實人生亦如球場，有順境也有低谷，一時得失，從來定不了最終結局。

四年一等候，四年一狂歡。賽事終會落幕，但足球帶來的熱血與感動不會消散。